

试论建立民事诉讼庭前证据交换制度

韩 璐

内容提要：我国法律环境的现实状况表明构建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决不可照搬西方国家的规定。法律环境的内在制约决定了我国该项制度的构建必然体现过渡性、阶段性，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众法律意识的提高、律师职业的发达及法律援助制度等配套措施的健全而逐步调整完善，最终达到当事人充分举证、交换证据，而法官完全中立裁判的目标。

随着我国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深入，庭前证据交换已成为我国证据制度完善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但审判实践中，庭前证据交换的实施尚难以自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民事诉讼庭前证据交换尚缺乏系统制度设计，庭前证据交换的主持机构、举证时限、当事人举证与法院指导举证、查证关系等问题均缺乏完整的操作性规定。本文借鉴西方国家庭前证据交换制度之立法经验，结合我国现行法律环境及试行证据交换之运作实践，提出构建与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具体设想。

一、西方国家民事诉讼制度中庭前证据准备程序评介

西方各国中，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民事诉讼法因法律渊源、价值目标等的差异，具体制度架构上各呈特色。而于纷繁各异之中，各国立法亦体现了某些共同的特点和趋向。仅以英、美及法、德为代表对两大法系民事诉讼庭前证据准备程序作一简要评介。

（一）英美法系

英国民事诉讼模式系典型当事人主义模式（adversary system），强调庭审时的“集中审理”，早期并无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实践中出现“诉讼突袭”现象。为平等保护诉讼当事人权益，英国确立了庭前证据开示制度，完善审前准备程序。英国现行审前程序主要由四个阶段构成：传唤状的送达（writ of summons）、诉答、证据开示（disclosure）及庭审指导。其中的证据开示阶段指称证据资料的开示与查阅程序（disclosure and inspection of documents），即指双方当事人将其现有或过去占有、保管的或在其控制范围内的，与诉讼有关的证据资料向法院或其他诉讼当事人披露的程序。英国 1999 年修订的民事程序规则对证据开示予以更为详实的规定，大体包括如下内容：

其一，证据开示范围。该规则提出了“一般开示”（standard disclosure）的概念，指称当事人赖以证明

主张的证据资料,不利于该方当事人或他方当事人抑或有利于他方当事人的证据材料,以及相关的应用指南(practice direction)要求该当事人开示的证据资料。而对于即便与案件有关,但开示将损及公共利益的资料,被要求开示人有权拒绝开示。至于涉及公正、公共利益、医师报告(expert medical evidence)内容、秘密信息(包括个人财务状况)的资料,及出于保护儿童、患者利益的需要不应公开的资料,对方当事人不得主张“强制开示权”。

其二,证据开示方式。依英国民事程序规则,当事人应自动向对方出示书证材料而无需对方提此要求,若当事人愿意,其亦可以宣誓声明(affidavit)的方式提供证据。相关应用指南则对必须使用宣誓声明的情形作了具体说明。一方当事人亦有权要求对方作出对事实的“自认”(admit facts),该“自认”可在该案庭审时被该一方当事人用作反对该对方当事人的证据。但在法庭允许的情况下,该对方当事人可修正或撤销该“自认”。在该“自动开示规则”适用出现障碍,即一方不开示证据材料,或者一方对对方的清单(list)不满时,当事人可用传票申请法官作出开示裁定,并附上宣誓声明,说明申请人认为该证据材料应列入清单的缘由。此外,英国法向来以“不得因他人的讼争打扰第三人的平静生活与隐私”为由不考虑非当事人的证据开示,而此次的民事程序规则明文规定了非当事人证据开示问题,不妨视为追求诉讼公正宗旨下公权力向私人生活领域的又一渗透。

其三,违反开示要求的制裁。英国民事程序规则规定,除法院另有裁定(order)外,证人陈述(statement)或证据概要(summary)应在规定期限内开示,未在此期间内开示的,法院庭审时将不召集该证人作证,该证据亦不能作为证据采信。此外,“强制开示”情形下,当事人不服从法官开示裁定的,法官可命令勾销当事人的请求或答辩书,同时作出该当事人败诉的判决;或以藐视法庭行为予以制裁。从而,以证据失权与实体败诉保障开示要求的适用。

其四,法院对证据开示的控制。英国民事程序规则规定,法院应就需证据佐证的争点,决定争点所需证据种类、性质及提交该证据的方式加以指导,并可依职权排除本可被采用的证据,还可限制反问(cross-examination)。此外,法院还可指导当事人分阶段开示、查阅。

美国民事诉讼模式亦是当事人主义模式,早期亦未设定庭前证据交换制度,仅设立诉答程序(pleading),交换诉状和答辩状,而将诸多问题置于庭审中解决。实践中同样导致诉讼上的“突然袭击”。美国大法官特雷勒(Traynor)曾言:“真实最可能发生在诉讼一方合理地了解另一方时,而不是在突袭中。”为保障当事人平等对抗,促进庭审结果的真实与公平,美国1938年修正《联邦规则》时确立了“发现程序”,赋予双方当事人在开庭审理之前向对方当事人要求出示与案件有关的事实与信息的权利与手段。借此,当事人得以充分了解彼此所持有的证据,明确争点,提高诉讼效率。然而发展到80年代,大量诉讼代理人滥用发现程序赋予的诉讼权利,拖延诉讼,严重影响诉讼效率。因而,1983年联邦民诉规则修改时正式提出了“管理”的概念,通过举行审前会议、安排日程来强化法官对发现程序的管理。在审前会议上,双方律师与法官进行非正式的会谈,旨在指导、管理当事人进行发现程序,制止当事人无意义的诉讼活动。美国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开示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其一,召开当事人会议,制定开示计划(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二十六条第六款)。开示计划通常包括:证据开示时间、方式,需要开示的事项以及开示是从多方面进行还是限定或集中在特定的一些争点上进行;按照法律规定应对开示做哪些限制等等。

其二,证据开示的范围。规定任何一方当事人可以要求对方当事人提出与诉讼标的有关联、且不属于保密特权的任何事项,并对保密特权加以列举:委托人告知律师的案件情况、夫妻间的秘密、患者告知医生的情况、牧师在忏悔者忏悔中得知的情況、国家机关履行职责时形成和收集的情报等。

其三,证据开示方法。规定双方当事人有权使用录取证言(depositions)、向对方当事人提出质询书(interrogatories)、要求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提供与案件有关的物证(discovery of documents and things)、检查受害人身体的和精神状况(physical and mental examination)、要求自认(request to admit)等方法收集、交换证据和信息。

其四,违反开示要求的制裁。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三十七条规定了四种方式的处罚:一为可判处不服从法院命令的人藐视法庭罪,处以拘留、罚金等相应的处罚。二为不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时即认定对方提出的问题已被证实,并禁止再就此问题进行反驳和抗辩。三为不经庭审即可驳回不服从法院开示命令的当事人的诉讼或缺席判决其败诉。四为在开示阶段没有充分理由,不向对方出示其占有的证据的,庭审时该证据将被禁止作为证据使用;如果未开示非因故意而是过失,法官可以允许当事人在法庭上出示该证据,但此时对方当事人可申请延期审理,并可要求有过失的一方负担相关的费用。

其五,法院对证据开示的控制。法院通过指导、管理当事人进行证据开示、监督当事人利用开示程序的措施、限制当事人利用开示方法的次数及规定强制开示义务、最初出示义务和补充出示义务等途径管理证据开示,提高效率。

(二)大陆法系

法国传统民事诉讼信奉绝对当事人主义,将法官封闭在当事人划定的诉讼框架内,实践中诉讼阻滞现象严重。为加快诉讼进度,法国从1935年起开始改革庭前程序,设立了指挥法官制度,但未取得明显成果。^⑨1972年诉讼法改革要点即在于设置准备程序法官,专门负责审前准备程序的管理。1975年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进一步加强了准备程序法官的权力。在法国,当事人主要通过四种方法进行准备程序:其一,当事人之间交换诉状和答辩状等准备书状;其二,当事人之间传递书状(凡庭审前当事人未传递的书状不得在法庭上作为证据提出);其三,传递证人陈述书,若证人在法庭外的陈述书在开庭审理前向对方当事人传递即可作为证据;其四,在审理前准备阶段,当事人有权向法院申请请求对方当事人或第三人提出与案件有关的书证和其他文书。法典未对证据开示的范围作详尽说明。对违反开示要求的行为则给予一定制裁:一方如持有一项证据,法官得应另一方的申请命令他出示,对违反命令的当事人必要时用罚金给予制裁。法官亦得应当事人的申请命令第三人在法律没有禁止的情形下出示他所持有的文书。不执行此项命令时,法院亦能使用罚金予以制裁。^⑩法典赋予准备程序法官监督当事人准时交换诉讼请求和通知证件(若不交换书证,法庭上不得使用)、监督事实调查等权力,强调对证据开示的管理,以强化法官的指导、督促来克服绝对当事人主义的陈弊。

德国民事诉讼起步阶段基本实行当事人自由放任主义,强调“一步到庭”诉讼方式,实践中不可避免导致诉讼拖延、效率低下。1976年《简化诉讼程序法》对原民事诉讼法典进行全面修正,改“一步到庭”为审前准备与法庭审理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1976年德国民事诉讼法典进一步规定法官可采用口头准备或交换书证两种方式进行审前准备,审前书证准备活动中,法官通过审查和督促当事人提交书证来发现证据、明确争议点。同时,当事人调查证据须按法院证据裁定进行,裁定中指明哪些问题应调查证据以及证人和鉴定人的姓名,法院以证据裁定排除与争执点无关的证据,以此实现对当事人举证的指导。此外,德国法在审前证据收集问题上将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改为适时提出主义,强化证据失权效力,即如若当事人庭审时出示审前并未告知对方当事人的证据,则法官可根据情况考虑不采纳此证据^⑪,以此保证当事人严格按审前书证交换程序交换证据。

纵观上述,尽管各国法律规定各有千秋,但也不乏共通之处。试概括其共同特点如次:其一,审前证据交换制度的逐步确立,系各国民事诉讼法发展的共同趋向。英美法德各国审前证据交换制度均经由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相对完善的发展过程,各国法律实践均有效证明审前证据交换制度的价值与功用。其二,各国审前证据交换过程中均强调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英美具有浓厚当事人主义传统,审前证据交换主要由当事人主动进行;法德虽属职权主义色彩较浓的大陆法系,但也强调当事人自行进行证据和信息的交换,自行商定最终进入法庭审理的事项。其三,各国审前证据交换程序均强调法官的指导、督促职能。各国均在实践中发现,若无法官必要的指导与管理,证据交换不免会混乱无序。诉讼效率与诉讼公正不可避免受影响。因而各国法院均赋予法官相应的权力,监督证据交换过程,制止当事人无意义的诉讼活动。其四,各国不同程度地规定了证据交换中的举证时限制度,即当事

人须在规定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关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权的法律后果。从而敦促当事人及时举证,促进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

二、我国现行法律环境对构建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内在制约

比较研究仅是为我国构建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提供一个借鉴,倘不对我国本土法律环境予以考察,而一味生搬硬套,难免会出现淮南橘淮北枳的结局。我国自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来,公民法律意识日渐苏醒并增强,涌向法院的民事、经济案件数量逐年上升,性质纷繁复杂,社会整体层面纠纷规模呈增大态势,一定程度上超出了法院现有审判能力,导致积案与法官的疲于讼累。增加法官数量显然只是杯水车薪的解决途径,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改变低效率的法院大包大揽的传统民事审判模式,消除其内在的结构性矛盾,调动当事人的主动性与参讼积极性,而法官仅需以居中裁判者的身份借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与信息处理案件。如此,诉讼效率自然得以大幅提高,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紧接着的一个问题便是,在我国现行法律环境下,当事人有否可能于庭前自行收集到充分证据,从而开庭时为法官提供足以作为案件裁判基础的信息?当事人毕竟不可能一律法律科班出身,素质亦良莠不齐,指望他们领会与掌握案件的实质,从而系统地有步骤地查证、举证,终究不甚现实,除非有律师的介入。而当事人能否获得律师的法律支持,又取决于律师这一法律职业发达与否,当事人能否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到所需的法律服务,以及当事人是否有足够的财力“购买”法律服务这两个前置性、先决性条件。

至于律师职业发达程度,一个重要指标即为法官与律师人数比例^④。不妨对英、美、德、日等国及我国该项指标作一比较。^⑤据英格兰 1996 年司法统计,在地方法院,有资格主持审判的法官为 518 名,主要负责审前程序的法官为 321 名,而开业律师的人数则为 55673 名,法官人数仅为律师人数的 1.5% 左右;据美国 1994 年司法统计,联邦和各州的法官总数为 46000 人,而律师人数则达 80 多万,若以律师人数为 100,则法官人数仅仅约占律师人数的 6.5%;德国 1993 年有法官 18913 名,开业律师则为 67562 名,前者约为后者的 28%;日本 1988 年以来普通法院和家庭法院的法官编制总共只有 2017 名,即便加上未获法律家资格的简易法院法官,总人数也不超过 4000 名,开业律师 1996 年则达 15925 名,法官人数只占律师人数的 13% 到 25% 左右。反观我国,1986 年法官人数约为律师人数的 6 倍^⑥;发展至 1997 年,全国法官人数约为 17 万余人,律师 98902 人(其中专职律师 47574 人,兼职律师 18695 人,特邀律师 12892 人)^⑦,法官人数约为律师人数的 1.7 倍;1998 年律师人数增至 101220 人(专职 51008 人,兼职 17958 人,特邀 10966 人)^⑧,法官人数无准确统计数据,但即便仅维持上一年的 17 万无任何增长,法官人数亦约为律师人数的 1.6 倍。与西方国家律师人数远多于法官人数形成鲜明对照。

法官与律师人数比例体现出整个社会司法资源于法院内和法院外的配置分布状况。西方国家中律师人数远多于法官人数,从而一方面,法官囿于现有人力资源不可能对现实生活中大量的民事经济案件主动依职权去取证、查证,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法官居中裁判具有必要性;另一方面,因律师职业的发达,当事人能够借助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完成查证举证的任务,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法官居中裁判又具可能性。而我国律师人数明显少于法官人数,从而律师在诉讼与非诉讼法律事务中所起的作用远未达到其本应达到的程度。不少案件无律师代理,当事人本身又未必完全懂法,倘若法官不主动依职权为其调查取证,则往往会出现“有理败诉”的局面,导致案件处理结果偏离事实上的公正。因而在我国,因律师职业的欠发达,当事人未必能够完成查证举证之责,法官为尽可能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的权威与社会正义,不得不自行填补因律师缺位而出现的空白,于是,律师事业发达与否,便成为当事人能否有效承担举证责任乃至庭前证据交换能否切实推行的一大制约条件。

当事人是否有足够的财力“购买”法律服务系另一瓶颈问题。对于经济困难缺乏在公开市场上“购买”法律服务财力的当事人而言,较高的法律服务费往往令他们望而却步。而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刚

刚起步,还远未臻完善,无法切实保障每一位经济困难的当事人都能平等地获得法律服务权。自身不具备专业法律知识,又因经济窘迫无法获得充分的法律服务,自然容易处于诉讼中的弱势地位,影响其充分举证,亦波及庭前证据交换效果。

我国本土法律环境的现实状况表明我国构建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决不应该照搬西方国家的规定。法律环境的内在制约决定了我国的相关制度构建必然体现过渡性、阶段性,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众法律意识的提高、律师职业的发达及法律援助制度等配套措施的健全而逐步调整完善,最终达到当事人充分举证、交换证据,而法官完全中立裁判的程度。

三、构建与完善我国民事诉讼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具体设想

(一) 理论设计

我国一些地方法院已着手试行民事诉讼庭前证据交换,并在实践中创造性地探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方式与措施。笔者拟结合我国试行庭前证据交换之运作实践,探讨相关的理论问题,以为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系统确立提供理论依据。

1. 主持机构

对庭前证据交换的主持机构,学者们主张不一,有谓主审法官主持^①,有谓书记官主持^②,亦有谓由专设的预审法官主持^③。司法实践中上海市高院及四川成都市中院均试行合议庭法官主持庭前证据交换^④,而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两级法院则试行书记官主持。^⑤究竟由谁主持庭前证据交换较佳?不妨简要分析各自利弊:合议庭法官(主审法官)主持庭前证据交换的优点在于倘若当事人庭前提出撤诉、和解诸类主张,合议庭法官便可及时加以处理,从而分流不必进入庭审的案件,加快诉讼节奏;缺点在于法官庭前即与当事人接触,未免又回到“未审先定”之窠臼,庭审不免又流于形式。由书记官主持的优点在于可以克服上述由法官审理的不足,且事务性工作由书记官开展,法官工作压力得以减轻;缺点在于证据交换中当事人提出撤诉、和解等主张时,书记官无法进行实质性处理,诉讼效率会受影响。但书记官可立即向合议庭法官汇报该情况,从而让合议庭法官及时介入,及时裁决。至于借鉴法德等大陆法系国家作法专设预审法官主持庭前证据交换,优点在于审判法官不必介入庭前程序,确保其庭审时的中立性;缺点在于导致法院内部机构膨胀,职能重叠,悖于效率与效益原则,也不符我国国情。因而,笔者主张以书记官主持庭前证据交换为宜。

2. 举证时限

所谓举证时限,系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承担证据失权法律后果。^⑥英美法德等各国都将举证时限与审前准备程序联系在一起,并明确规定逾期出示的证据将不被作为证据采纳,从而有效避免诉讼拖滞,促进纠纷的顺利解决。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举证时限无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第76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但该规定只涉及当事人因故不能及时举证时法院可另行指定举证期间,对举证最后期限及逾期证据有否效力并未说明,实际上仍是采用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实践中常会出现“当事人有证不及时提交,缺证不及时补,无证不及时说明”的现象^⑦,以至延滞审限,造成案件久拖不决。因而有必要借鉴外国法规定设置举证时限。司法实践中上海高院已试行举证时限制度,规定案件受理后,或经过庭审调查,当事人提出补充证据,或法庭认为一方当事人负有进一步举证责任的,可据案件具体情况,所需证据的远近难易合理确定举证时限(本市范围内收集的,提出之日起10至15日之内;外省市收集证据的,提出之日起30日之内),最迟至庭审辩论终结前止。并规定当事人确有困难需延长举证期限的,

可于期限届满前向法院申请,由法院审查决定。逾期不举证的,视为举证不能。^⑧上海高院的做法无疑为其他法院提供了蓝本,实践中也确有一定成效。但笔者以为借鉴西方各国规定将举证时限与庭前准备程序相联则更妥。以庭审辩论终结为举证时限终点,无疑会架空庭前证据交换之功效,使其流于形式而不具实质意义,当事人大可在庭前证据交换阶段隐匿其主要证据,留待法庭审理时搞突袭,双方当事人依旧无法实现平等对抗。故笔者主张以庭审之日为法定举证时限终点,庭审前不曾出示交换的证据,庭审时再出示,法庭原则上视为证据失权不予采信。对于确有正当理由(如不可抗力)导致逾期举证的,法院审查后可酌情予以考虑。当事人有正当理由申请延长举证时限的,法院可酌情指定合理举证时限。

3. 当事人举证与法院指导举证、查证关系

西方各国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均强调当事人的主动权与自由处分权,当事人自行查证,自行进行证据与信息的交换,法官仅起指导、督促作用。我国庭前证据交换制度中,也应强调发挥当事人查证举证交换证据的积极性,但基于我国现行法律环境的不尽如人意,法院在一定程度上还必须承担本应由律师承担的职责——指导当事人举证。此外,对当事人无法自行收集的证据(如银行存款、工商局注册档案等),则由法院查证。法院的指导举证,实践中主要有两种方式:一为普遍性指导,即针对不同案件类型制定“当事人举证须知”,对每一类案件应举出何种证据作出详细规定,并在收案时下发给当事人及其代理人;^⑨二为个别性指导,就个别举证事项及需要收集的特定证据等随时给当事人以指示。^⑩前者之一般性、公正性应是不容置疑的,对于后者,笔者以为,应在双方当事人均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以体现公开、对等的民诉举证指导原则。至于法院查证,实践中亦有两种做法:其一坚持传统理念,赋予法官主动依职权调查取证权。如海南省洋浦经济开发区两级法院规定,四种情况下法官指定书记官在双方当事人在场的情况下调取证据:第一,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而申请法院查证的;第二,必须由法官代表法庭现场勘验或委托有关部门审计、鉴定的;第三,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有矛盾,不排除疑点难以定案的;第四,当事人因自身健康等条件限制不能自行收集而又无力委托诉讼代理人的^⑪。其二则仅赋予法官依当事人申请查证权。如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积极推行当事人申请法院查证制度。法院制作《请求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书》,同权利、义务告知书同时送达各方当事人。申请书内容包括:申请人名称、申请日期、申请查证事项、申请人不能自行查证的原因、证据线索等。对于当事人递交了申请书的,法院审查后决定是否查证。法院审批时主要掌握三点原则:一是负有举证责任一方当事人明确提出申请要求法院查证;二是所要收集证据与本案争议的事实相关且是定案所必需的证据;三是当事人因非自己所能克服的客观原因造成当事人自己难以收集证据^⑫。部分法院还探索试行调查令制度,法院审查同意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签发申请的,签发调查令,持调查令的律师可在规定的有效期限内,向指定的有关单位收集调查令上载明的调查内容。^⑬此举调动了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取证积极性,减轻法院查证压力,不失为一行之有效的制度。

法院是否必须依当事人申请才能查证?笔者以为,庭前证据交换过程中,法院主要应负起指导当事人举证的程序性职责,对案件实体性的判断应留待庭审中。易言之,法院通过对当事人的举证指导,使当事人明了哪些证据其应出示,若因客观原因无法查证,即可据调查申请请求法院查证。法院只有在对案件进行实体判断时才需判定证据矛盾的双方何者证据有效,也才需依职权主动查证以最终断案。若庭前法院即介入案件实体问题,难免又重蹈“未审先定”覆辙。故而,庭前证据交换过程中,法院仅得依当事人申请查证,庭审中法院才能依职权主动查证。

(二) 操作程序设计

第一步,受理案件后,书记官经初步审查认为需要进行庭前证据交换的案件,送达起诉状、答辩状、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同时,送达《当事人举证须知》、《请求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申请书》及当事人双方证据交换通知书。通知书中写明第一次证据交换的时间及举证时限。

第二步,书记官主持双方当事人就其持有的证据进行第一次证据交换。书记官引导双方当事人

轮流出示证据。当事人各方将证据正本提交给书记官,按照对方当事人人数递交证据副本。书记官对证据交换过程中出示的所有证据均予登记。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递交申请书。第一次证据交换结束时,书记官整理出当事人争议焦点,告知当事人围绕焦点收集证据,摒弃与争点无关的取证活动。并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愿意和解。倘若初次证据交换即能达到证据明确足以断案的程度,或各方当事人认为仅能提供如上证据,则不需再行交换证据,而径待庭审;若出示的证据不足以断案,或当事人提出尚需补充证据,或当事人向法院递交了取证申请书,则书记官可宣布一定期限后再次交换证据。并再次告知举证逾期的法律后果。

第三步,第二次证据交换。当事人双方将第一次证据交换后补充调查的新证据(包括自行收集的证据和申请法院调查的证据)予以充分出示。第二次证据交换后,原则上不再专门召集当事人交换证据,但庭审前一方当事人又有新证据的,应及时向书记官汇报,由书记官将新证据及时转告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可据此提出延期审理的请求。第二次证据交换后,书记官应将整个证据交换过程、争议焦点、举证责任、证据情况等写成书面报告,随同案件材料移送审判庭。

注:

李蓉:《中英民事诉讼审前程序之比较》,载江伟、杨荣新主编《民事诉讼机制的变革》,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436页。

An Introduction to the New Civil Procedure Rules, No. 32. 15 & No. 32. 18. Practice direction 32. 1; 沈达明编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上册),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

沈达明编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下册),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参见李蓉前引文,第437页。

宋冰:《美国与德国司法制度与司法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0页。

Roger J. Traynor, Ground Lost in Criminal Discovery, 39 N. Y. U. L. Rev. 228, 249 (1964)

参见李祖军、赵信会:《论庭前程序的完善》,1999年民事诉讼法年会论文。

参见陈桂明、张锋:《审前准备程序比较研究》,载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4月版。

参见白绿铨:《美国民事诉讼法》,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李汉昌:《美国民事审前程序中值得借鉴的几个问题》,《法学评论》1998年第6期。

⑪沈达明编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上册),第142页。

⑫沈达明编著:《比较民事诉讼法初论》(上册),第148页。

⑬谢怀庆译:《德国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第87页。

⑭王亚新:《民事诉讼准备程序研究》,《中外法学》2000年第2期。

⑮英美德日该项指标数字均引自王亚新前引文。

⑯《中国法律年鉴》1987年版,第883页。

⑰《中国法律年鉴》1998年版,第71页、第1256页。

⑱《中国法律年鉴》1999年版,第1039页。

⑲连永燕:《建立庭前交换证据制度刍议》,《人民法院报》1998年5月6日第三版。

⑳王媛、许源:《预备庭制度》,载江伟、杨荣新主编《民事诉讼机制的变革》,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447页。

㉑李祖军、赵信会:《论庭前程序的完善》,1999年民事诉讼法年会论文。

㉒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的探索及若干做法》;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是如何改革和完善审判方式的》,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走向法庭》,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3页、第185页。

㉓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走向法庭》,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页。

㉔陈桂明、张锋:《民事举证时限制度初探》,《政法论坛》1998年第3期。

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走向法庭》,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第54页、第128页、第144页、第154至155页、第55页。

㉞参见王亚新前引文。

(作者系厦门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石 泉